

MIAOZIGOU AND DABAGOU
The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Ancient Sites of Primitive
Inhabitant Tribes in the New Stone Age

庙子沟与大坝沟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魏 坚 ◆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庙子沟与大坝沟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

(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魏 坚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庙子沟与大坝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10
ISBN 7-5000-6949-9

I. 庙… II. 内… III. 文物—考古—内蒙古 IV. K87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458 号

责任编辑：韩小群 严 峻

封面设计：刘家峰

责任印制：徐继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 68345015)

<http://www.ecph.com.cn>

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43.75 插页：105 字数：112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500 册

ISBN 7 - 5000 - 6949 - 9/K · 426

定价：2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Miaozigou and Dabagou

**The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Ancient Sites of Primitive
Inhabitant Tribes in the New Stone Age**

I

Inner Mongolia Archaeology Reach Institute

Edited by WEIJIAN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序

张忠培

近 30 余年来内蒙中南部的先秦考古工作，至少应当提及以下三人。

田广金于上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对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当是考古学者对内蒙中南部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社会形态和环境研究开创新局面、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进入 80 年代后，田广金先仍在河套内的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后转到岱河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崔璿先在清水河县发掘白泥窑子，后将精力集中于包头市区的阿善和西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机遇的人。他在大学中学得的知识较为扎实，能识别不少文化或类型的陶片，在田野考古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1982 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最初跟随田广金在内蒙古中南部做考古工作，1983 年起开始独立主持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先是发掘庙子沟与大坝沟等遗址，后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主持配合准格尔煤田建设的考古发掘。田广金、崔璿、魏坚在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工作中，是彼此互补的一个整体。他们三人的努力，基本上为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序列与谱系，以及为探索其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提出了引起学界重视的颇为系统的见解，从而使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搭建了新的平台。

这是为魏坚主笔的《庙子沟与大坝沟》写的序文。关于魏坚，除了上面提到的话外，还得说几句。他参加考古工作 21 年，从未离开过田野考古，显示了自身价值，可喜的是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这主要是：一是在河套内补充了田广金于朱开沟发掘未见的一些空白，这主要是提出了永兴店文化的命名；二是填补了黄旗海的空白，重要的是命名了庙子沟文化。本文开头就说过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住机遇的人，这里应补充的是，他对已抓得的机遇，有的似乎又抓得不紧，例如，他在准格尔的工作是较为系统的，可是，除发了一些不太成熟的简报外，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报告。丰产了却没有转化成丰收，令人遗憾。这个意见，我不只一次地当面向魏坚提过。其所以在此又一次提出这个意见，是我见到了他主笔的这份报告，又一次燃起了我对他系统整理准格尔发掘资料的期望。

《庙子沟与大坝沟》这份报告，除以文字、插图和照片按遗址、按单位公布了发掘所见资料外，还公布了涉及留存遗存的主人、石制品原料、动物遗骸与环境的九个附录，又对遗存分期、年代、文化命名和聚落形态及文化源流诸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无疑是一份全面、详细而又客观地发表了资料的报告，又是一个具有个人分析意见的报告。总之，这份报告为研究庙子沟及大坝沟遗存和庙子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提供较为充分的论据，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我看了这报告的文字及插图目录和前言、第四章、第五章及六个附表之后，我觉得还有以下的问题需在这篇序言中作些简短的讨论。

其一，报告从遗存的典型层位关系出发，以及遗迹及其内涵器物的形态，对遗迹进行了分期，但没有说明同期的遗迹是否原本属于同一层位，由于据类型学认识的期别所跨的年代，往往长于窖穴以及由草、木及泥土构成的房子的使用年代，例如殷墟商文化平均约 70 年一期，能说那里的窖穴，以及那里的草、木和泥土结构的房子，可耐得上 70 年的使用期吗？按文化速度递增的原理，早于殷墟商文化约两千年的庙子沟文化为期别所跨的年代，当远远超过 70 年，因此，同属一期的诸单位，很可能不是同期使用的单位。这样，在没有认定庙子沟及大坝沟同期诸房屋及窖穴原本属于同一层位、同一使用年代的情况下，我们自然难以直接依据它们的期属，去讨论房屋的布局、室外窖穴与房屋的关系及其相关的诸问题。

其二，报告基本上没有对遗迹及遗物，尤其是未对陶器进行分类、分型和编式，这样处理材料的方式，是近年来发表的几本报告的通例。据有些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其实，这样处理材料的方法也未必能超然主观，因为，人们对遗存的发掘、整理及至编写报告，就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实践过程，即使是看来能直白客体的绘图与照相，如果要客观地表白客体特征的话，也超然不了对客体的主观的正确认识，可见，忌讳主观，实际上是忌讳不了的，因此，需要避免的当是那些不能反映客体真实的主观，坚持追求正确地表述客体的主观认识。忌讳对包括陶器在内的遗存的分类、分型和编式的研究，最终的结果或者直白地说，就是忌讳类型学。没有考古类型学，又如何界定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类别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期别。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靠类型学来确定的。这类分期，不仅包含层位学能确定的遗存相对早晚的涵义，更重要的是还表述着所研究的考古学文化的部分质变，而且无遗存的分类、分型与编式，则无法界定和表述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的关键不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而忌讳对遗存进行分类、分型和分式的类型学研究，而是要在这类研究中摒弃主观随意性，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表述客体的科学的

类型学研究。有人说这不是摒弃类型学的问题，我们主张的仅要求考古报告原样地发表原始资料，以使研究者能更客观地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类型学研究。这种想法未免天真，且不说考古报告的文字，甚至其插图和照片都避免不了主观性，试问在同等学力持同样客观心态的学人，是面对遗存，还是面对表述遗存的文字、图及照片更能作出贴近客体真实的认识！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倒掉洗澡盆中的脏水，也将这盆中的孩子倒掉了，即为了避免主观随意性，而在考古报告中放弃对遗存的实事求是的类型学研究。

其三，庙子沟文化，无疑是在西阴文化统一局面解体后，而于内蒙古中南部兴起的具有显著地域性特征的强势文化，它基本和半山文化、以菜园子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泉护二期文化、义井文化、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文化、屈家岭文化及良渚文化同时。在文化关系方面，庙子沟文化同半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义井文化及雪山一期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处在中国文化重组和社会变革的文明形成的时代，同时，庙子沟文化的出现，既是长城地带文化沟通并形成文化交流带的标志，也是其文化碰撞、交流及融合的结果。

庙子沟文化的渊源，无疑可追溯到当地的西阴文化，但其间在年代上还不直接衔接，且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考古材料中，也基本上缺乏连接西阴文化及庙子沟文化，即和半坡四期文化及马家窑文化年代相当的遗存，这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关于这一个阶段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目前已出现了若干线索，例如崔璿在《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 L 点发掘简报》发表的 H6:1 陶刀^①。这件陶刀是由彩陶片改制而成的，其上的纹饰，同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在崔璿的这一简报中，未公布该陶刀所在单位 H6 与这陶刀共生的其它遗物，也未发表这单位的层位，因此，依据如此公布材料的情况实难以说明它是否是一独立阶段遗存的代表，以及它所在单位的年代早晚。然而，当崔璿将这件陶刀归入被他称之为“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即庙子沟文化时，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纹饰的风格，迥异于“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的 BLG1:17 及 BLT7④:17 这两件彩陶的纹饰。魏坚在这本《庙子沟与大坝沟》报告的《海生不浪类型分期图》中，他将 BLG1:17 及 BLT7④:17 定为这类型的一期。庙子沟文化这类形陶纹饰，尤其是其中的三角网纹、棱形网纹和锯齿纹等这些纹饰元素，和半山文化同类纹饰的相似程度，令人认为它们当源于半山文化。这是将庙子沟文化和半山文化定为同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证据。依据马

^① 崔璿《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 L 点发掘简报》图五之 8。《考古》1988 年第 2 期。

家窑文化早于半山文化的事实，亦该推定马家窑文化早于庙子沟文化。据此，一是难于将 H6:1 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归入庙子沟文化或这文化之后的遗存；二是即使归入庙子沟文化，也当将其视为是这一文化保存的文化传统。无论这两种之一的任何一种情况，H6:1 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存在于白泥窑子的事实，都得被视为是内蒙古中南部存在着与马家窑文化同时的遗存的征兆或证据，又是留存这一遗存的主人同马家窑文化居民进行了文化交流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总之，我相信内蒙古中南部未来的考古，定将发现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遗存。至于这一遗存的文化属性，自然只能待今后揭示的事实才能进行研究。

在这一《报告》中，魏坚将他命名的庙子沟文化分为庙子沟、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三个类型。这说明他既见到这三个类型的同一性，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海生不浪类型”保留了使用小口尖底瓶的传统，它和庙子沟及阿善二期的区别，似乎大于庙子沟和阿善二期之间的区别。同时，这些类型的未来命运也是不同的：“阿善二期类型”演变为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类型”蜕化为以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目前虽未发现“庙子沟类型”的直接后裔，但依据“阿善二期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及《报告》关于“庙子沟类型”和“老虎山文化”存在着源流关系的论证的逻辑，则未发现的“庙子沟类型”的直接后裔，也当是一种考古学文化了。如此这般，我们在此见到了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种图景：一个包含三个类型的文化，其中的三个类型进而演化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至于庙子沟文化的三个类型，为什么只是“类型”，而未被认为是三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对考古学遗存如何分类的复杂问题，我在此就不讨论了。需说明的，虽基本同意魏坚的观点，但也认为对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仍存在着不小的空间。

如前所说，在黄旗海及岱海周围地区，迄今仍未发现年代上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相当的遗存，即未见到“庙子沟类型”的直接后裔，仅揭示出被认为和“庙子沟类型”有一定源流关系而晚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所代表文化的“老虎山文化”。这虽可从“庙子沟类型”和“老虎山文化”的比较中，揣测出“庙子沟类型”直接后裔的某些文化特征，但一是揣测终究仍是揣测，二是在“阿善二期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区内，由于未发现与“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当的文化，而难以在相邻的同期文化的比较中清楚地观察出“老虎山文化”的自身特征，故进一步制约了对“庙子沟类型”直接后裔的文化特征揣测的准确性。因此，为了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自庙子沟文化之后的谱系关系，还必须在黄旗海及岱海地区揭示出与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或与阿善三期同期的遗存，以及在“阿善二期类型”及“海生不浪类型”

区域内发现与“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同的遗存。这又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必须填补的缺环。

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祝贺《庙子沟与大坝沟》即将出版。也急切地盼望有关同仁对以往发掘的内蒙古中南部其它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出版报告，这是推进内蒙古中南部考古研究的必须，更是保护文物的必须，为了这两个必须，我们还需奋进！

成稿于 2003 年 2 月 14 日下午

刘观民先生的来信

魏坚同志：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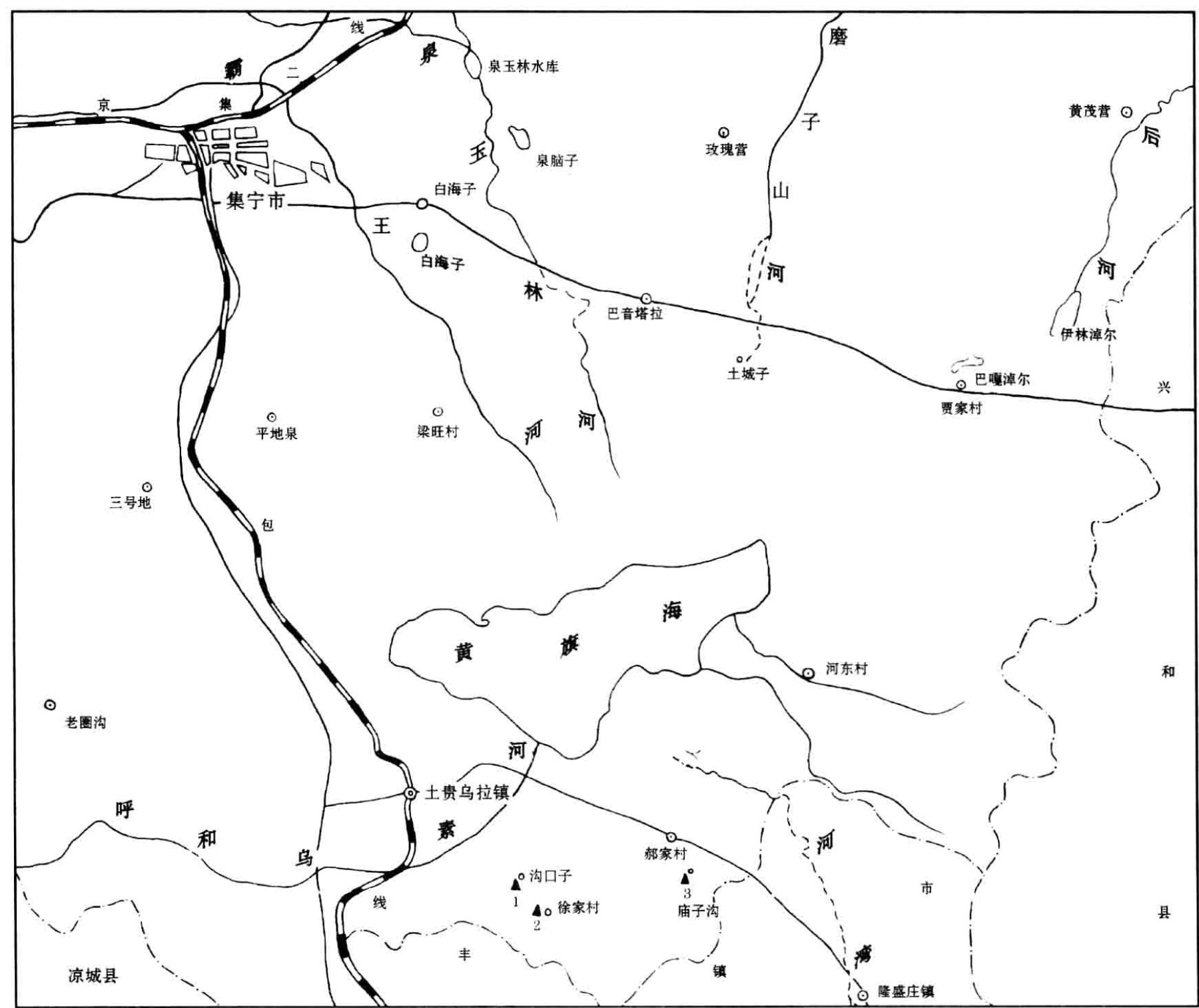
晋祥和延平到你那里参观后，给我介绍了情况。昨天，秉琦先生对我说起你在庙子沟的发现，据李仰松同志对先生的介绍说，庙子沟没有尖底瓶，彩陶也不多，这一点与黄河沿岸的遗存有很大的不同。他想了解一下庙子沟陶器群的概貌，关心这组发现是否是张家口外仰韶时期的又一区系。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如果有空给写个信来，介绍一下概貌，描一组器形图。莫负先生对你发现的关心。专此奉闻。握手！

观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前言

苍茫险峻的阴山山脉，以其雄浑的气势，横亘在内蒙古高原的中部。在其南侧阴山脚下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丘陵起伏，河流曲折，湖泊星罗棋布。在这些地貌特征并不相同的地理单元内，分布着众多的原始文化聚落遗址。黄旗海南岸的丘陵地带就是这些远古文明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本书公布的是这一区域中，庙子沟和大坝沟两地三处遗址的全部考古发掘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图一）。



图一 庙子沟、大坝沟遗址位置示意图

1. 大坝沟遗址 I 区 2. 大坝沟遗址 II 区 3. 庙子沟遗址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自然环境

黄旗海盆地所在的察哈尔右翼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中南部地区，其地东邻兴和县，南接丰镇县，西与卓资县相靠，北界察哈尔右翼后旗。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 度 49 分~113 度 40 分，北纬 40 度 41 分~41 度 43 分。黄旗海盆地属于阴山山地两侧低山丘陵中的 13 个串联盆地之一，在白垩纪时形成坳陷盆地，沉积为紫红色、灰绿色、黄白色泥质页岩、粉砂岩、含砾砂岩等河湖相沉积物。盆地内海拔约为 1230~1400 米，周围环抱的低山丘陵和熔岩台地海拔 1400~1700 米左右。盆地内的岩层主要为下白垩系和较厚的第三系、第四系冲积湖积成因的砂和沙砾石层，盆地周围为冲积洪积扇裙。主要山脉有岱青山、大敖包山、灰腾梁和琵琶梁等。

黄旗海盆地及其周围的地貌形态，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即：湖泊、冲积湖积平原、黄土丘陵台地、熔岩台地、基岩丘陵等。盆地中心的黄旗海是内蒙古高原面积较大的内陆湖泊之一，东西长约 20 公里，南北宽约 9 公里，湖水面积约 110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3~5 米，最大水深约 10 米，蓄水量约 5.3 亿立方米。湖水补给除湖面降水外，主要来源于霸王河、泉玉林河、大喇嘛河、大河湾、呼和乌素河和磨子山河等 19 条河沟，这些河沟一般较为短小，河水暴涨暴落，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盆地的冲积湖积平原在黄旗海四周有广泛分布，邻近湖泊的地区主要是湖积平原，在山前主要为坡—洪积平原和冲积平原。熔岩台地海拔 1500 米左右，从中新世晚期开始经过多次熔岩流喷发形成，因长期遭受侵蚀，台面被深切的沟谷分割成面积不等的桌状山和剥蚀山。黄旗海南岸呼（呼和浩特）——大（大同）公路西南侧的主要地貌是基岩低山丘陵，其岩性主要为太古界的片麻岩和花岗岩。在基岩低山丘陵的山前地带及河谷的阶地之上，覆盖着厚约几米或十几米的黄土或黄土状土，形成黄土丘陵台地，这些黄土主要是在晚更新世以来由风力吹蚀而成，部分是流水再次搬运堆积的产物。黄旗海地区已经处于黄土丘陵分布的边缘地带。

黄旗海盆地为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是东南季风、西南季风与西风环流共同作用的地带，这三种大气环流的强弱变化，决定了该地区的气候，尤其是降水的状况。在内蒙古气候区划中，这一地区属于温凉半干旱偏润气候区，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夏季受大陆低压控制，多寒干燥，风多雨少，昼夜温差大，冬季长达 5 个月，年平均气温 4.5 度 C，最高气温 39.7℃，最低气温—34.4℃。年平均降水量为 376.1 毫米，多集中在夏季的 7~8 月上旬，平均湿度为 0.4~0.5，年均无霜期 131 天。

该地区土壤属于草原栗钙土地带和暗栗钙土带，原生植被为半干旱区森林草原，其特征是草原、草甸和森林植被共存，其中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是主要类型，在低湿地区有盐生、中生、湿生的草甸植被。该地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浅层水深约在 2~5 米之间。就气候条件而言，该地区本应为典型的草原地区，但是，由于广泛分布的草原、黄土丘陵和玄武岩台地的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在人为作用下，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垦为农田。因此，该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表现为灌溉农业与旱地农牧业以交错的生产方式共存。

察右前旗所在的黄旗海地区，由于四周较高、中间低洼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多样性的经济生产结构。全旗经济以干旱、半干旱农业为主，适宜种植小麦、马铃薯、莜麦、胡麻等喜

凉作物，还有谷、黍、甜菜等粮食和经济作物。该地区畜牧业历史悠久，曾是内蒙古高原著名的八大牧场之一。主要草场类型为山地干草原草场、丘陵干草原草场和低温草甸草场，大部分为优良牧草。现在仍利用山林草地和河滩沟畔从事畜牧业，主要牲畜有牛、羊、马、驴、骡等家畜。同时，还利用水库沟溪和大、小淖尔海子养殖鱼类，主要有青海湟鱼、鲤鱼、鲫鱼、草鱼等。此外，在黄旗海周围盛产芦苇，野生中草药亦分布较广，在丘陵山地间还存在着成片的天然和人工森林资源。

该地区交通发达，京（北京）——包（包头）铁路、集（集宁）——二（二连）铁路和110国道、208国道纵横全境，形成交通干线。东进可与张家口相接，西入则进呼和浩特平原，北上即是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南下丰镇、凉城与晋北相连。

二、历史沿革

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所在的察右前旗黄旗海地区，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在黄旗海南岸地区，目前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阶段的原始文化遗存，除已经发掘的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外，还有徐家村、武家村、古楼村等多处，这是这一时期该区域原始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阶段。

商周以降，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在该地区活动的主要有鬼方、土方，以及后来被称作北狄的林胡和楼烦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其经济结构亦主要以从事畜牧业为主，文化遗存相对较少。进入战国阶段，随着韩、赵、魏“三家分晋”局面的出现，赵国逐渐向北扩张势力。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雍即位后，“北破林胡、楼烦”，并且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①，将赵国的势力拓至阴山脚下。这条长城自兴和县的西营子乡向西，沿阴山南麓进入察右前旗北部，经黄茂营、高宏店、弓沟、三成局、煤窑村、大土城，进入卓资县境内的哈达图乡。自此，该地区正式纳入赵国的版图，属赵国在北部设立的云中、雁门和代三郡中的雁门郡管辖。发现的呼和乌素、大九号，及比邻的卓资县六苏木、丰镇市九墩沟战国墓地；卓资县城卜子、三道营子战国古城，以及在黄旗海周围地区出土的大量战国钱币等，反映的应当是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

汉魏时期，黄旗海地区是中原王朝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往来征战、彼此融合，并先后控制的地区。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空前强大，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②。到汉武帝时，汉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反击战，将匈奴逐至漠北，黄旗海地区再次归入汉朝的版图，归代郡管辖。同时，在黄旗海南部地区修筑长城。该段长城由凉城县的麦胡图乡向东北进入察右前旗境内的老圈沟、呼和乌素，再入丰镇市的红沙坝乡向东而去。在察右前旗的呼和乌素现在还保存有该段长城和相应的障城，并在长城沿线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量墓葬。东汉晚期，兴起于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已经逐渐南迁至乌兰察布草原，他们在这里习武练兵，积聚势力，最终越过阴山，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建国后黄旗海地区属恒州之旋鸿县（县址在今察右前旗和丰镇市交界处）管辖。黄旗海在北魏时称作南池或乞伏袁池。在察右前旗的下黑沟、呼和乌素等地，留有东汉和北魏时期的鲜卑墓葬。

隋唐之际，察右前旗先为突厥所占，后在隋王朝的辖境之内，属马邑郡之云内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统辖，黄旗海称乞伏泊。唐王朝统一全国后，该地区属单于大都护府（治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同（1）。

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管辖。

辽设五京,黄旗海地区归辽西京道的丰州(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管辖,黄旗海此时称白水泺。在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子村西辽代家族墓地的六号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契丹女尸,是我国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金朝建立后,沿袭辽制,该地仍属金西京路抚州之集宁县(治所在今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古城)管辖。黄旗海仍称白水泺。

元朝时期,这一地区属中书省集宁路(由金代集宁县升)和大同路平地县(治所在今察右前旗三号地乡苏集村南)管辖。在集宁路古城及周围的墓葬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丝织品,并发现了元代的钱币窖藏,反映了元代该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明朝建立后,朱明王朝在黄旗海之南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修筑了明长城,蒙古贵族与明王朝严重对立,连年战争不断。黄旗海地区同整个蒙古草原一样,遭到了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人口凋敝,农田荒芜。到16世纪中叶,蒙古俺答汗与明朝修好,这一地区才又逐渐开发为半农半牧区。清朝时,按满洲八旗建制,清廷将大同、宣化边外的蒙古诸部,编为察哈尔八旗,黄旗海地区分属正黄旗和正红旗统辖。黄旗海因此而得名。民国初年,仍袭清制,归察哈尔都统管辖。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由绥远省政府管辖,二十六年(1937年)沦为日伪蒙疆政府所属旗。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归属绥远省管辖。

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后,黄旗海地区隶绥远省。1954年,改设察哈尔右翼前旗,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至今。

第二节 发现与发掘概述

1985年9~10月间,察右前旗新风乡砖窑在庙子沟村南的山坡取土时,发现了部分陶器、石器和人骨,一名山东籍的民工,将这一情况向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作了报告。文管所所长孙家潭和罗锦明、姚永宏随后到庙子沟砖窑取土现场进行勘查,证明是文物普查时已经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即安排保护遗址现场。10月初,文管所派罗锦明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汇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负责人李逸友先生和魏坚认定是一处仰韶阶段的文化遗存。10月10日,魏坚和郭治中等人前往察右前旗,携同孙家潭、罗锦明到庙子沟遗址进行考察,对已经暴露的遗迹做了紧急清理,并决定对该处遗址进行发掘。10月20日,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排下,魏坚、郭治中会同乌兰察布盟文物管理站的崔利明、王新宇,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的孙家潭、罗锦明、姚永宏以及技工张清秀等,对庙子沟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同时对遗址的沟沿部分进行了第一次清理发掘。由于气候的原因,钻探和清理发掘工作至11月5日结束。钻探面积3万平方米,清理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同年冬天即对发掘材料进行了整理,并根据钻探和发掘所获资料的分析,作出了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揭露的工作计划。

1986年7月28日至10月14日,历时两个半月,对庙子沟遗址做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遗址的南半部。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王新宇、张清秀、李连顺、王庆华、杨春文等。由于遗迹距地表较浅,遗迹现象清楚,故采取布 10×10 米探方的方法,共布探方31个(编号QMT1~T31),连同清理,共发掘4100平方米(彩版贰,1)。

1987年5月7日至9月20日,用了近四个半月的时间,对庙子沟遗址做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主要在遗址的中北部和北部边缘。发掘工作仍由魏坚主持,参加发

掘工作的有：张清秀、王庆华、杨春文、李连顺、张晓云等。布 10×10 探方 39 个（编号 QMT32 ~ T70），连同清理的面积，共发掘 4900 平方米（彩版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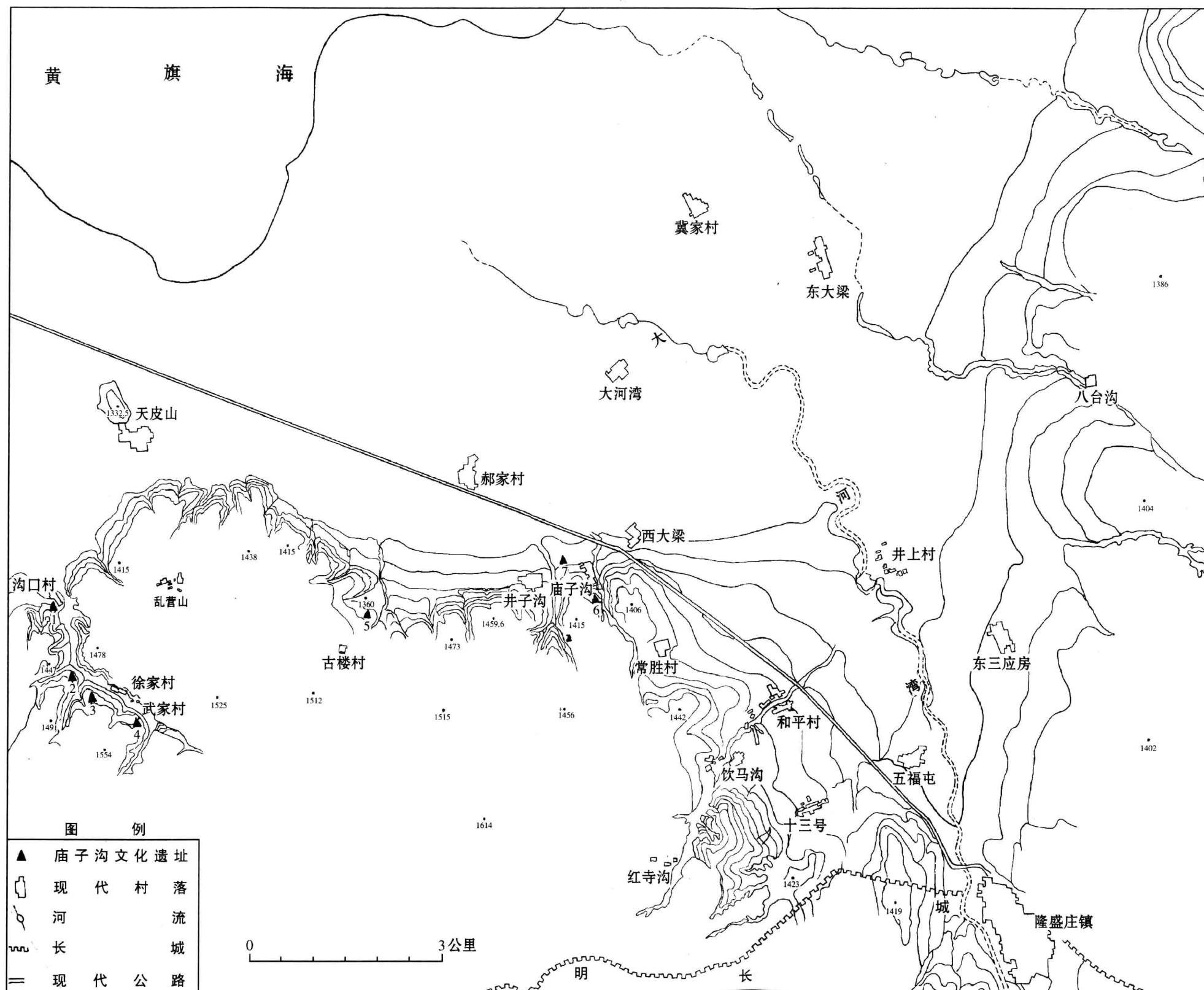
通过连续三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我们感到庙子沟一类遗存，在黄旗海地区绝非孤例，在地形条件相近的黄旗海南岸的丘陵地带，应当还会有同类遗存存在。于是，在 1987 年 9 月庙子沟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组织进行了沿黄旗海南岸丘陵地带的考古调查工作，由东向西，发现了与庙子沟遗址文化面貌相近的庙子沟村北的庙子沟遗址 II 区、古楼村遗址、徐家村遗址、武家村遗址、大坝沟遗址 I 区、II 区 6 处遗址（图二）。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庙子沟一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和年代跨度，1988 年 5 月，我们对调查中发现的大坝沟遗址 I 区，在考古钻探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 5 月 10 日开始，到 6 月 23 日结束，历时一个半月。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张清秀、李连顺、王庆华、杨春文和张晓云等。本次发掘在 I 区的北半部，共布 10×10 米探方 7 个（编号 QDIT 1 ~ IT7），包括扩方部分，总发掘面积约 736 平方米（彩版肆 1、2）。

1992 年 5 月 2 日至 7 月 25 日，又在大坝沟对 I 区和 II 区遗址进行了发掘（彩版叁）。发掘工作由魏坚主持，参加发掘工作的有：李兴盛、罗锦明、张清秀、杨春文、王庆华、陈爱旺、田栓钱、谢海英和张晓云等。对大坝沟遗址 I 区的发掘，位于遗址的南半部，与 1988 年发掘区隔围沟毗邻。本次发掘布 10×10 米探方 41 个（编号 QDIT8 ~ IT48），包括扩方和在 1988 年发掘区西侧的小面积清理，总揭露面积 4830 平方米。大坝沟遗址 II 区的发掘区位于遗址中部，布 10×10 米探方 6 个（编号 QDII T 1 ~ IIT6），连同扩方，总揭露面积 707 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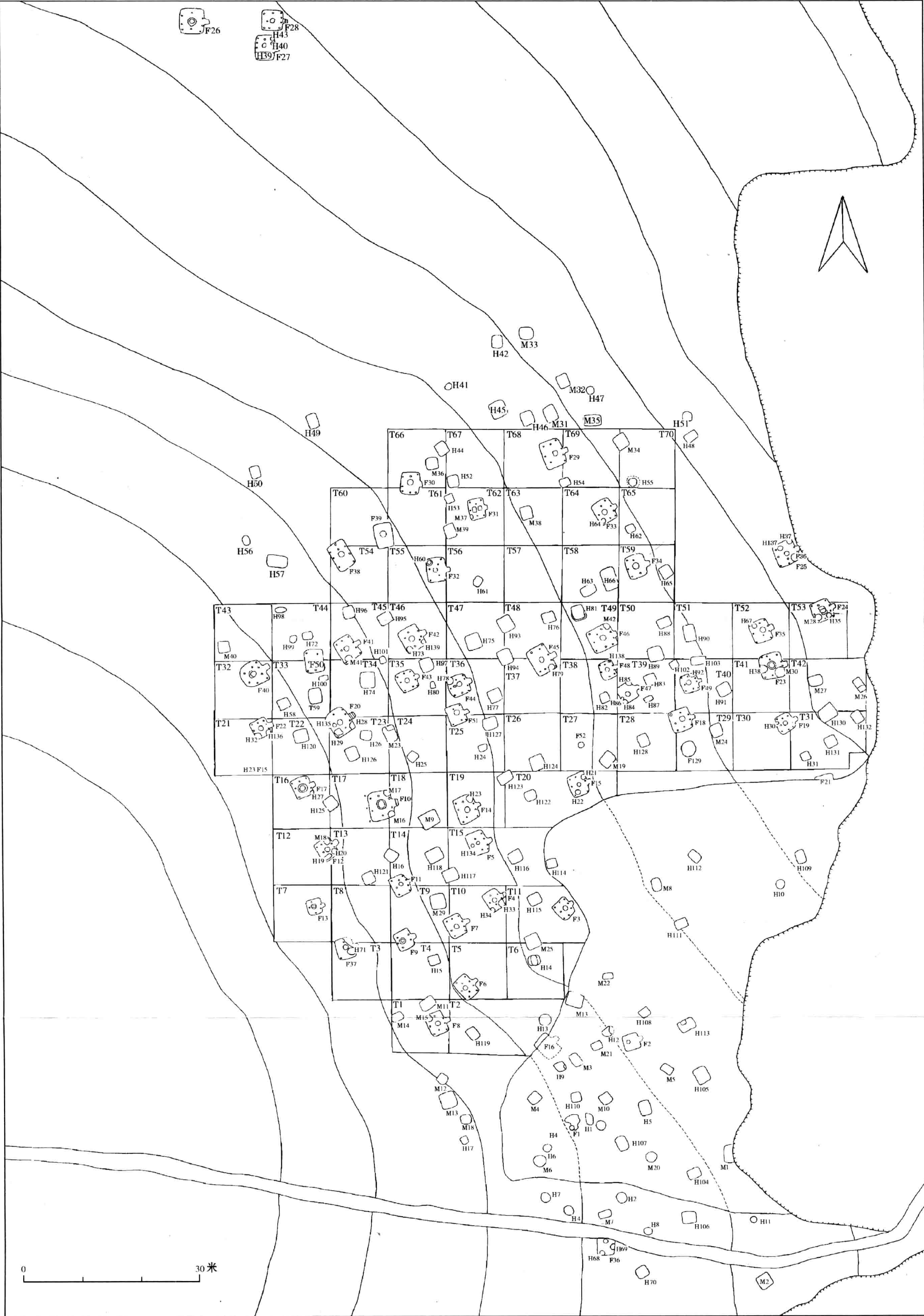
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的发掘成果，曾以《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考古纪略》（《文物》1989 年 12 期）和《庙子沟与大坝沟有关问题试析》（《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年）等简报和论文予以发表，经过十多年的整理工作，个别遗迹单位的编号或稍有改动，故上述文章若有与本报告内容相悖之处，以本报告为准。

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工作，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看了庙子沟遗址的发掘成果后指出：庙子沟遗址所代表的很可能是张家口以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彩版伍，1）。在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先生，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佟柱臣先生、乌恩、杨虎、刘晋祥先生，都先后到发掘现场考察，对发掘和整理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彩版陆，1）。北京大学李仰松、李伯谦教授都先后到工地指导工作，严文明先生更是几次亲临庙子沟和大坝沟，对发掘和报告的编写做了十分具体的指导。多年来，内蒙古文化厅和文物处的领导，乌兰察布盟和察右前旗的领导（彩版伍，2），以及各级文化、文物部门的同事和朋友们，对这一原始文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心和支持（彩版柒，1、2）。苏俊、王晓华、王大方、梁志高、武锦仁、乌图雅等领导，李逸友、田广金、郭素新、张郁、葛精卫、陆思贤、丁学芸等前辈，都曾多次到过庙子沟，为遗址的发掘保护和深入研究，以及在遗址建立工作站的问题出谋划策（彩版陆，2）。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经历时，不能不为他们的无私和敬业而感动。还有许多领导和朋友对这一发掘和研究给予了关心和帮助，不能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致谢。



图二 黄旗海南岸庙子沟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1、大坝沟遗址 I 区 2、大坝沟遗址 II 区 3、徐家村遗址 4、武家村遗址 5、古楼村遗址 6、庙子沟遗址 I 区 7、庙子沟遗址 II 区



图三 庙子沟遗址遗迹分布图